

“从战争、对立到和平”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

高莹莹

2015年11月21日,由日本华人教授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蒋介石研究群合办的纪念战后70周年“从战争、对立到和平——来自历史研究第一线的声音”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日本千叶商科大学(日本千叶县市川市)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此次会议邀请了来自日本的爱知大学、千叶商科大学、早稻田大学、中央大学、法政大学、骏河台大学、大东文化大学、冈山大学、横滨国立大学、福井县立大学、武藏野美术大学、信州大学,中国大陆的北京大学、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和中国台湾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等相关学术机构的学者,以及历史爱好者、传媒界人士等70余人与会。其中有15位学者在会上以学术报告的形式,围绕四个议题:历史研究第一线眼中的战争与和平;抗战时期的中国经济与外交、边疆问题;历史研究与“历史认识问题”:该如何跨越战争;面向未来构筑新时代的日中关系,阐述了各自的最新研究成果。

日本华人教授会代表、爱知大学李春利在开幕词中表示,在战后70周年之际,举办这样的国际学术讨论会,具有特别的意义,日本应该记住这段历史,并进行深刻的反省。千叶商科大学校长岛田晴雄出于对中国抗战研究的浓厚兴趣,也特别在海外出差前录制了影像,预祝会议圆满成功。

都留文科大学的笠原十九司做了题为《战后七十年质问海军的日中战争责任》(戦後70年にして問う海軍の日中戦争責任)的主题演讲。众所周知,日本海军在东京审判中未被追究战争责任。其原因为何?日本海军在侵华战争以及二战期间究竟有没有犯下战争罪行?有哪些战争罪行?这些迄今没有受到研究者的重视。笠原梳理了日本海军自一战以来到20世纪30年代两次伦敦会议后积极扩张的发展历程,历数二战期间日本海军在淞沪会战、南京大屠杀、占领海南岛、重庆大轰炸中发挥的作用,强调在日中战争中,日本海军同样有不可推卸的战争责任。

一、历史研究第一线眼中的战争与和平

北京大学臧运祜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区研究述评》中,对抗战以来中外史学界在沦陷区领域的研究状况进行了梳理,以中国学术界的研究现状为主要考察对象,提出四点建议:1. 区分“日—伪”关系,提高沦陷区研究的理论水平;2. 深化政治、军事史研究;3. 加强社会、文化史研究;4. 重视台湾史研究。骏河台大学井上久士的《日军的加害与抚顺日本侨民的意识——通过平顶山事件的思考》(日本軍の加害と在撫順居留民の意識——平頂山事件を通じて考える),从日本《产经新闻》2015年9月13日刊登的文章《满洲文化物语(6)》说起,对比了今天与事件发生时亲历者和日本驻华大使的不同记录,呼吁面对历史问题时,当今的日本人不要忘记作为加害者的侵略事

实,同时也呼吁中日两国人民真正做到“以史为鉴,面向未来”,为日中关系走上正常和平友好的发展道路提供机会。大东文化大学田中宽《〈讲述战争〉中所见之日本人的战争记忆——“受害”中的“加害”意识》(『語り継ぐ戦争』にみる日本人の戦争記憶——「被害」の中の「加害」意識)思考的是如何传承战争记忆的问题。作者提出记忆传承的关键是,记忆什么样的“形象”和吸取什么样的教训。作者以日本《朝日新闻》连载《Voice 声 讲述战争》为例,分析了日本人在战争记忆中强调“受害”大于“加害”的“形象”,呼吁中日两国国民正确、客观、全面地认识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友好。对德日两国战争罪责的追究,以往主要关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以及盟国各自设立的军事法庭所进行的不同层级战犯的审判,南京师范大学严海建的《通向战后审判之路:盟国对二战战罪惩处拟议过程述论》,另辟蹊径,注意到战后审判其实是基于战争期间既已开始的战罪惩处拟议而形成,通过对国民政府外交部的相关档案进行梳理,对盟国战罪惩处的拟议过程,以及中国国民政府在其中发挥的作用进行了评述。千叶商科大学赵军的《彷徨于“散沙”“群氓”“亡国之民”之间的对中国国民性的认知——战败前日本知识分子的对华错误认识》(「散砂」「群氓」「亡国の民」に彷徨う中国人国民性への認知——敗戦まで日本インテリ層の中国誤認識をめぐって)以川岛浪速、内田良平、平野义太郎、宫崎滔天、中西功、矢内原忠雄等日本近代史上知名的中国通为例,分析了他们各自关于中国国民性的主要观点及形成背景,认为日本最终的战败与此前对中国的错误认识亦有一定关系。

二、抗战时期的中国经济与外交、边疆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周祖文的《动员、民主与累进税:陕甘宁边区救国公粮之征收实态与逻辑》,把视角聚焦于陕甘宁边区救国公粮的征收问题。不同于以往研究,周祖文注意的是救国公粮征收过程中的实际运作形态和逻辑,阐释了救国公粮从动员、民主到真正实现农业累进税的三个发展过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吴敏超的《抗战前期的浙西:从沦陷区到游击区》探讨的浙西是抗战史沦陷区研究中较少被人关注的一个领域,作者利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战史会档案、浙江省档案馆所藏浙西行署档案、台北“国史馆”所藏有关蒋介石档案及已刊资料,描绘了日军对浙西占领初期存在的各种军事和社会问题,阐明了浙西地区由沦陷区变为游击区的具体过程。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姜涛的《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英美三国军事合作交涉》,运用台北“国史馆”所藏蒋介石档案、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院所藏蒋介石日记,对珍珠港事变后蒋介石的战略构想、就入缅问题与英美两国的具体交涉、在军事委员会设立问题上蒋介石的积极筹划与英美矛盾进行了详细阐述。大东文化大学鹿锡俊认为,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至翌年1月日本发出“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声明的半年间,是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和与战进行最终抉择的关键时期。其报告《苏联因缘的虚实与蒋介石的和战抉择》通过对官方档案及徐永昌、蒋介石等个人日记的梳理和解读,探讨了三个方面的问题:1. 蒋介石是如何看待苏联因素的;2. 中方的判断是否符合日苏关系的实际情况;3. 上述二者在国民政府的和战抉择中起了何种作用。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吴启讷在《云南土司在战争中和战后的困境与抉择:1942—1952》一文中,讨论了抗战时期的边疆问题。作者以身处云南与缅甸交界地带的云南土司为例,梳理了抗战期间及战后,中国对云南土司政策的转变与云南土司面对不同外在环境时对中央政府既合作又抵抗的抉择历程。云南民族大学的段金生虽然未到会讨论,也提交论文《学术与时势:20世纪30年代中国西北、西南边疆研究的转承起伏》,对20世纪30年代中国近代边疆研究热点从西北到西南的学术变迁,从历史传统和社会政治的现实因素两方面进行了剖析。

三、历史研究与“历史认识问题”:该如何跨越战争

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黄自进的《迈向和解之路——中日战争的再省思》(和解への道:日中戦争の再検討)分析了中日两国及海峡两岸关于中日战争的既有研究中,针对战争目的、抵抗策略、抗日战争的主导权、战争责任、军事力量的对比、日本侵华战争的连续性问题上的争论,提出应分两个步骤在学术界对中日战争进行重新探讨,在以往关于加害者与受害者两方面的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加上“开发者”与“被开发者”的视野,重新探讨诸如日本在“满洲”投资,日本的军事战略与东亚社会等问题。黄自进提出重新探讨的目的是通过各方学者的合作,形成跨越意识形态与国境的对战争史的新认识。冈山大学姜克实在报告《战史研究的方法与文献记录史料》(戦史研究の方法と文献記録史料)中阐释了历史记忆问题。作者以台儿庄大战与平型关大捷为例,呼吁史学家在进行口述史料及使用文史资料时应注意鉴别和使用旁证。同时,姜克实认为日本防卫省防卫研究所战史研究中心公开的大量战史资料,客观反映了日军作战的真实面貌,呼吁抗战研究时应更多地重视实证研究。横滨国立大学村田忠禧的《1885 年日本公文书中看到的事实》(1885 年の日本の公文書から見えてくる事実),按照时间顺序,对日本公文书中山县有朋及西村捨三就钓鱼岛等地区国权建设的几次申请令进行排比考察,阐述了冲绳县及钓鱼岛等领土在历史上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变迁,呼吁日中两国学者采取客观、冷静的态度,使领土问题不再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障碍。福井县立大学凌星光的《如何处理历史认识问题》(歴史認識問題にどう対応すべきか),针对 21 世纪恳谈会报告以及安倍谈话进行了评价,他认为 21 世纪恳谈会报告反映了日本中间派和偏右派的认识,虽然有对历史的歪曲,但明确承认了日本的侵略给中国及亚洲带来的巨大损失,可以作为中日韩三国学者讨论的基础。关于安倍谈话,应看到安倍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也不得不开始转向现实主义外交。凌星光呼吁有关方面不要在历史认识问题上做出挑衅性的行为。

四、面向未来构筑新时代的日中关系

早稻田大学的天儿慧回顾了近年来日中两国政府对双方关系的处理,认为双方都存在回避问题的倾向。不过,从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中可以感受到中国的外交方针发生了转变,中国正向大国外交、致力国际协调的方向努力。今年 11 月初,中日韩三国首脑会谈在首尔召开,双方政府的态度明显向积极方面转变。当然,日中两国之间,仍然存在对立、摩擦及相互不信任,在日本民众对华态度的问卷调查中,讨厌中国的比例依然高达 90%,可见日中关系的未来并不乐观。日中两国各自都面临不少问题。中国虽然在经济、军事实力上取得大幅增长,但却亟待解决诸如环境污染等深刻问题。日本则面临老龄化、少子化以及 GDP 下降等问题。日中双方应取长补短,互相了解、互相帮助,这样才能为深化两国关系、减少误会提供机会。关于日中和解与德欧和解的比较,天儿慧认为两者的基础不同,德国与欧洲各国对和解的努力远远早于日中两国,德国与法国等欧洲国家关于历史问题的讨论也已经非常充分。而日中两国才刚刚起步,双方在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很多不同,在处理两国关系时需要更多的理性。因此,双方知识分子的作用非常重要。可喜的是,知日中国人和知日本人的数量都在增多,随着年轻人之间交流趋向活跃,积极思考日中关系的年轻人也在逐渐增多,这些都将成为改善日中关系的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抗日战争研究》主编高士华,介绍了《抗日战争研究》为中日两国学术交流所做出的积极努力,曾经连续刊登 11 篇日本学者的论文,得到了中日两国学术

界的广泛认可。《抗日战争研究》编辑部同时注意为中日两国学者的交流提供机会,邀请日本青年学者参加抗战史研究讨论会,着力培养下一代担当中日学术交流的人才。

高士华还向日本学者介绍了习近平总书记的7月30日《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深入开展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研究》讲话,认为这为抗日战争研究指明了方向,不论对抗日战争研究还是对中日两国关系的改善,都是一个良好契机,两国学术界都应该为推进这场战争的研究而努力。当然,侵略就是侵略,日本应该先进行自我反省。

信州大学久保亨认为从历史学家的角度看,安倍谈话存在不少问题,比如在评价日俄战争时,完全不提对中国东北人民的伤害。久保亨指出,安倍谈话在日本民众中基本没有受到批评,这是因为安倍的看法和日本教科书的内容是基本一致的。因此,并非日本的首相不懂历史,而是日本的历史教育出了问题,导致日本民众的历史认识也被扭曲了。作为历史学家,有责任改善日本的历史教育,撰写具有正确历史观的教科书。在日本,50万中学生中只有8万人选择世界史作为考试科目,同样,亚洲其他国家的学生也存在不了解本国史以外的历史的问题。因此,现实并不容乐观。不过,年轻人之间的交流确实正在增多,日本的学生也在积极地参加中国的研究生学术研讨会,这在以前是没有的。虽然现在日中两国相互观感不好,在讨论中日关系时,不应过分强调困难,而应相信感情是会变化的,日中两国的未来不要过于悲观。

中央大学姬田光义指出,安倍谈话的最大问题是,没有向子孙后代传达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历史。因此,了解中国的日本人需要做的是要让日本人相信那段历史的存在。姬田介绍了日本民间开展对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活动,如通过举行合唱、太极拳表演,宣传中国人民对日本战犯的善待等,强调中日两国一衣带水,必须互相信任,更多地展开民间交流。

华东师范大学王智新强调中日两国之间的关系是三千年友谊与五十年战争,呼吁从更广泛的视野、更长时段的历史眼光去理解和认识中日关系。

武藏野美术大学廖赤阳综合上述学者意见,指出为改善中日关系,知识分子要有强烈的使命感,心态上要做好准备,用更加国际化的视野,在更长的历史潮流中去认识和把握中日关系。

最后,本次会议的主要召集人之一、千叶商科大学的赵军在闭幕式上做总结发言,高度评价了此次国际研讨会的成果。他指出,本次学术研讨会首先在中日战争史领域,围绕沦陷区、边区、解放区、汉奸、海军、国际视野下的中日美关系等诸多问题,从学术层面提出了新的观点,取得了新的进展。其次,对于普通民众的历史记忆与战争认识的问题,本次会议也有学者提出了新的看法。

抗日战争不仅是中国人民的斗争,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一环,因此抗日战争研究应该具有国际视野。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海外举办关于抗日战争研究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既可以加强和海外学者的交流,也可以把中国学界的研究成果介绍到海外,把中国学者的正义声音向外国民众传播,提高中国关于抗战问题的国际话语权。这次在日本举行抗日战争国际学术讨论会是一个积极的尝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以后应该继续进行这类学术活动。

〔作者高莹莹,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辑〕

(责任编辑:马晓娟)